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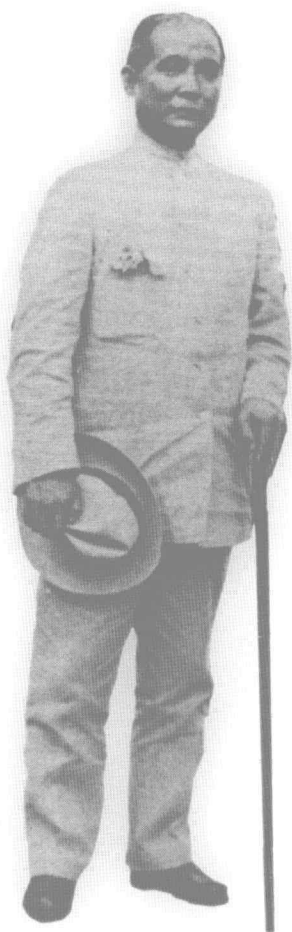
孙中山 对国内情势的审视

◇ 段云章 著 ◇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211工程”建设经费及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资助出版



孙中山 对国内情势的审视

◇段云章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段云章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10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

ISBN 7-306-01822-1

I. 孙… II. 段… III. 孙中山(1866~1925)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522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市东下路 6 号 邮编:528200 电话:0757-2233651)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1 插页 44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34.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孙中山历来重视世情国情，以之作为他进行革命、制定主义、纲领、政策、策略的依据。早在 1890 年，他就表示他已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①。到 1923 年，他更总结其数十年革命之经验，就是“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②。

关于“外察世界之潮流”，已问世的拙著《放眼世界的孙中山》曾试图做了一些探究。对于“内审中国之情势”，我多年来也做过一些探索，现将前此有关研究成果汇集成书，质之当世。但孙中山对中国情势的审视牵涉面很广，而中国的情势又异常复杂多变，要想对这个问题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自非个人力所能及。本书所汇集的仅是孙中山审视目光所及的几个主要方面的一些具体例证，望能略窥孙中山的国内观的堂奥于万一。由于这些研究成果，是前此 20 年陆续写成的，故参差不齐，有的观点也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此次集稿，为保存我的研究心路和足迹，除对个别原稿做了一点补充和修订外，基本维持原貌。无疑，本书很可能仍存错谬和不足，仍望方家予以指正。

收入本书稿件有 2 篇是我和别的同志合写的，现已分别注明，沈晓敏同志还帮助我清理了注释，这里，谨向他们致谢。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 页。

于此书定稿之时，心里确有说不出的滋味。回想 1961 年，我作为投入中国近代史专业学习刚一年的研究生，在史学前辈、我的业师陈锡祺、金应熙二教授关怀和指导下，写出首篇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论文，有幸参加了由吴玉章、李达同志主持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讨论会，这是我在史学领域的最早试步。蹉跎岁月，从那时到今年，竟过去了 40 年。在这段政治风波迭起的年代，多蒙史学界师友帮助、支持和鼓励，才使我冲破一些艰难险阻，在史学研究道路上有所前进，稍有刍荛之献；而且有幸应邀参加从 1961 年迄今的在国内举办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有标志性的历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今我已过古稀之年，本书极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本著作。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最使我深怀内疚的是我迄未完成某书局委托的较大型的孙中山评传的撰写，现在只好以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放眼世界的孙中山》和本书作为一点心愿补偿。于此，我谨向关心、帮助、信任我的师友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歉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陈胜彝、林家驹、邱捷、桑兵、赵立彬等同志的支持。原中山大学出版社领导、已离休多年的刘翰飞同志于年逾古稀之年，在帮助我出版《放眼世界的孙中山》之后，又以极大热情编审此书。一向支持我的内子李金桂女士也为我完成本书付出了辛劳。对于他们，我自应深表感谢。

作者 2001 年 1 月
于康乐园“别有春斋”

目 录

第一编 孙中山和国内重大事件

- 一、孙中山与 20 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初盛…………… (1)
- 二、孙中山的五个统一主张与民初政局 …………… (25)
- 三、1917—1918 年的护法运动与西南军阀 …………… (59)
- 四、孙中山与 1919 年南北议和…………… (82)
- 五、勉为其难的孙中山 1921—1922 年北伐 …………… (108)
- 六、孙中山的国家统一观与国共合作…………… (124)

第二编 孙中山和近代中国思潮

- 一、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浪潮…………… (140)
- 二、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理想…………… (171)
- 三、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的连接…………… (194)
- 四、评孙中山的“超越论”…………… (209)
- 五、孙中山心性文明观的民族化特色…………… (227)
- 六、孙中山对民国史的重视…………… (247)

第三编 孙中山和同时期人物

- 一、毛泽东对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的承接和发展…………… (259)
- 二、孙中山与黄兴、陈其美关系辨析…………… (265)
- 三、孙中山与黄兴、何天炯关系合议…………… (279)
- 四、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合与离…………… (297)

五、站在孙中山左右的廖仲恺与陈炯明·····	(320)
六、以孙中山革命事业为轴心的左右分趋——宋庆龄与 戴季陶·····	(348)
七、容闳的三次道路抉择与同孙中山的会合·····	(364)
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谭嗣同 思想的应和·····	(381)
九、孙中山与蔡锷救国心路的比较·····	(391)
十、孙中山与连横·····	(403)
十一、关于孙中山与唐继尧关系的研究·····	(422)

第四编 孙中山的地区观

一、辛亥时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南北观·····	(428)
二、孙中山与大西北·····	(457)
三、从龚自珍到孙中山对开发中国西部的关注·····	(480)
四、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香港观·····	(500)
五、孙中山对粤港连接的关注·····	(517)

第一编 孙中山和国内重大事件

一、孙中山与 20 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初盛

孙中山于 1894 年创立兴中会、决志进行民主革命之后，反复宣称在中国推翻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实行共和政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及其历史必然性。然而，19 世纪末，孙中山在国内既缺乏根据地，海外鼓吹又无效果，维新保皇影响又盛极一时，孙称这时是“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的“最艰难困苦之时代”^①。但到 20 世纪初年，情况出现了显著变化，革命风潮初盛，证实了他前此选择的民主革命道路的正确。从此，孙中山更加坚定信念，把革命往前推进。

“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② 20 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初盛，正是新的强烈的社会要求和中外反动派加紧勾结、顽固阻碍实现这种要求二者激烈斗争的产物，也是 1900 年后国内形势和阶级

^①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6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6 页。

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必然结果。

1900年后，民族危机的加深震人心弦。1903年1月，一家刚创办的革命刊物在其“叙论”中，就大声疾呼：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正在“风飏电激，席卷而东，集矢于太平洋，亚洲识微之士，莫不深瞑蹙额，惊走相告曰：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①。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1902—1903年，英、美、日等国又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迫使中国洞开内地门户，更肆无忌惮地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在中国大建铁路、矿山和工厂。据统计，除1900年前帝国主义掠夺到手的5700公里铁路，主要是这一时期动工筑造外，他们还在1901—1903年又攫夺到手2100公里铁路（已夺到手但后来未成路者未计入内）^②。到1903年，抛到中国市场的外国棉纱达1 015 400包，占了中国棉纱市场的88.69%，中国棉纱则只占11.31%^③，在外纱排挤下，中国纱业“均岌岌可危，不可终日”^④。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还一再扬言要瓜分中国。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在我国领土上进行厮杀；同时，在中国西藏，英俄也展开了激烈争夺战，英国甚至悍然派兵侵入西藏。

帝国主义侵略步步进逼，民族危机如此深重。而卖国腐朽的清政府却抱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帝国主义百依百顺。1901—1903年，清政府陆续颁布的“新政”，主要是作为欺骗人民、抵制革命的一种手段。正如当时报纸所揭露的：“惟其变也

①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上册，第434页。

② 据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9页。

③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57页，附表。

④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9页。

无善因，故其行之也无良果，愈经营，愈狼狈”，“外则言词奋发，内则腐败更甚；名则革旧趋新，实则顽持不已”^①。

对当时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加紧勾结、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孙中山在1901年《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和1904年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对此作了较尖锐的揭露和抨击，指出：“今天下之大事，无过于支那之问题矣！”“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而“甘于弃地，日就削亡者，清国之趋势也”，但分割中国或者保全中国（即保全清政府以代行其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都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正“奋发思图独立”的中国人民，“其肯甘受列强之分割，再负他族之新轭而不出死力以抗者，恐无是理也！”^② 孙中山在这时虽无法了解国内发生的所有情况，但他的观察分析，大体是得当的。

到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有所发展，1901—1905年新办了民族企业157个，较前一时期的104个有较大增长。在采矿业更出现了“趋之若鹜”的情景。然而，中国民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族企业的发展，是在深重的灾难中挣扎前进的。清政府颁布的《奖励公司章程》，客观上起着刺激民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但主要是为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它规定集股在50万元以上的厂矿创办人，逐级授予七品顶戴以上的官衔，“优加礼貌”^③，而大多数企业主则“无不疾首蹙额于地方胥役劣绅之需索刁难、种种苛扰”^④。广东南海丝厂在1903—1904年间“亏本至一、二万两之多者，十家而九”^⑤，有的地区要企业主将所获利润六分之四入官，甚至被任意收归官办。因此，商人市民“罢市毁关”的事件所在多

① 《东方杂志》第1卷第8号，第18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8—223、248页。

③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640—641页。

④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一年四月，总第3545页。

⑤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56页。

有。以 1903 年为起点，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商民还掀起了督责清政府向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的运动。如此等等，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清政府矛盾的尖锐化及其反抗意识的增强。华侨资产阶级也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东南亚各国的发展而得到发展。东南亚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型有限责任公司和旨在团结御侮、保护本阶级利益的华人商业或贸易公会。但是，由于祖国地位跌落，侨居地的统治资产阶级兴办的企业日益增多，一些部门（如糖业、锯木业、开采业等）的华侨企业饱受歧视、排斥和打击，更加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和向祖国投资的渴望。1903 年后国内掀起收回路权、矿权运动，华侨资本家首先响应，并相继创办了潮汕铁路、宁阳铁路、南洋烟草公司等大型华侨公司。宁阳铁路公司创办时，200 万资本一呼立集，其章程还明确规定，不收洋股，不招洋工，以杜绝帝国主义觊觎路权的阴谋。^①可是，清政府媚外卖国，“主客之形，几于倒置”，华侨“纵挈巨资，无从着手”；加之，官吏的“节节羁留，层层铃束”，奸商土恶的欺骗，以致“费时旷业，所损实多”^②。对此有所了解的孙中山就指出：不少华侨“一阅矿章，即废然返矣”！^③这种情形，特别激发了得不到清政府“恩赐”的那部分华侨资产阶级的恶感，日益转而要求进行民族民主革命。1903 年上海《苏报》案发生时，新加坡华侨资本家陈楚楠、张永福等以“小桃园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公开声援章太炎、邹容，并投稿新加坡《天南新报》。受保皇党影响最深的美洲华侨，也有一些侨商写信劝康有为不要再沉迷于保皇，应效华盛顿一样革命自立。肇源于华侨的被虐待、席卷全国和许多侨居地的 1904—

①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初稿），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 卷，第 4 编，第 18 页。

②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996 页。

③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 1 卷，上海民智书局 1930 年版，第 952 页。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不仅是华侨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鲜明表征，而且在侨居地“引起了中国民主的潜在力量的奋起”^①。

农民阶级通过会党活动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开展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1895年开始的，但仅限于广东一隅。就全国来讲，终19世纪，农民阶级还是走旧式农民斗争道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农民群众的斗争口号由“扶清灭洋”转到“扫清灭洋”，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这一反动同盟，因而贴合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潮流。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革命宣传和“当时震荡奔放之人心适相应和”，革命书报渐普及于下层，“甚至粗识之无略解诵读之町童里妇，几无不人手一编，心领而神会焉”^②。浙江会党经过革命知识分子兼商人敖嘉熊和龚宝铨、张恭、陶成章等人“勉以大义”，“莫不翕然从风，愿作革命马前卒，自是各属会党咸勃勃思动”，揭竿起事者时有所闻^③。湖南会党在革命知识分子刘揆一鼓动下也开始响应革命。随着就出现了湖南洪江会接受华兴会领导、江浙会党接受光复会领导共同反清的事例。这显示了会党本身民主革命意识的提高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会党联盟的重要进展。

在工人阶级的早期代表人物中，也有明确地认识到要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周云祥就在1903年4月慨然表示：“当今之世，可共事者，惟中山其人。”决以“内逐满洲为志”^④。这年5月，他为保卫矿权，毅然领导锡矿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

民族民主革命情绪在地主官僚的民主分子中也得到反映。《苏

① 转引自《马来亚之国民党》，载《东南亚历史》1961年3月。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8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页。

④ 《黄帝魂》，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黄帝纪元4614年版，第283—285页。

报》主人陈范、四川的卞鼎都在这时逐渐转向革命排满了。

总之，由于中国人民陷入了“其商凄凉，其农憔悴，其士苦，其工苦”，“闻其声则号寒啼饥”，“问其事则鬻儿荡产”的悲惨境地^①。各界人民都增长着反抗情绪，加强了斗争，清朝反动统治日益动荡。1903年，一个帝国主义者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也忧心忡忡地说：

至论中国近年政事之若何，则较1902年以前，并无进步。各省民愤如何，则直隶、四川两省乱事虽平，而根株终未尽绝，欲保死灰不致复燃，殊不敢必。粤西匪势甚盛，急切固未易遽平，……粤东则现虽平靖，而会党思乱已久，祸机所伏甚深，恐今日粤西之乱，难保其不见于东粤。……各省文人，皆有闻风兴起之势。^②

正是依据这种情势，孙中山于1901年即毅然表示：在中国，“人民揭竿而起，匹夫有天下，历史视为寻常……今中国人民宜推翻者有两重历史，曰外族满清之入主，曰现代政府之腐败，而皆为数千年起大革命历史所允许”^③。随后他特别关注1902年掀起的广西人民暴动，希望革命党人在广西乘机发动起义，再进军广州。

二

更令孙中山注目的是他欣然看到的：“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而且是“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

① 《国魂篇》，《浙江潮》第1期。

② 《某洋员查考中国矿务情形呈报本国政府文》，《湖南官报》三百九十六至三百九十八号，光绪癸卯年五月十三至十五日。

③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作”^①。这确是当时新形势的一大特征。

首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扩大。1900年前，先后派出的留学生总共不过三百余人；国内新式学堂也寥若晨星，一般知识分子尚在旧学、八股羁轭之中。1900年后，有几个新的因素使得这类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

第一，国事日非，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愤于辛丑条约加给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决计抛弃腐败的科举道路，向西方寻找富国救民的途径。他们认为：“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特别是在沿海沿江一些省份，留学运动，尤其是留日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群然以种祸相激切”的情景^②。他们一旦置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由于学习西方而国势日强的国度里，耳濡目染各种新书籍、新事物，因而“革命思想，沛然日滋”^③。

第二，戊戌变法所开导的学习新学的新风尚，“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已建立的学堂，在一些省份仍能维持，知识界对新学的追求，仍有增不已。他们“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④。1901年后，梁启超主持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继续传播西方政治学说，抨击清朝专制政府，“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辄十数”^⑤。据吴玉章同志回忆，那时他僻处四川农村，也读到这类新报刊。

第三，清政府为实行“新政”而亟需人材，较前多办一些新学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236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381页。

③ 《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第233页。

④ 《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03页。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626页。

堂，多派一些留学生，并对教学内容和用人制度进行变革。1901年后，清政府陆续下诏改科举，废八股、整顿京师大学堂，准许各省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同时，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款”、“自行酌办立案章程十条”等诏令，命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学成归国赏给进士、举人头衔。于是，过去借科举为进身之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走出私塾进入新式学堂或到外国学习。像湖南那样“童子闻风兴起，自愿筹备资斧赴彼（按指日本）就学”^①的事情，许多地方都有。《苏报》1903年1月8日的《论说》对此颇有赞词：“中国维新以来，至各行省皆设学堂，所以养人材，公学问，开风气，致富强，其有利于国家，夫固尽人而知之也。”^②

到1903年，留学生由上一年的600余人激增到1300余人。留日学生1904年增至3000人，1905年达8600余人。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增加人数更多。据统计，1903年在官立学堂学习的学生为1274人，到1905年便增加到102 769人。至于私立学堂学生，尚无统计数字可查，光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到1902年共有284所，学生10 158人。^③

这批猛增中的新式知识分子，还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趋势，一是这些知识分子从以前的沿海少数省区，扩大到14个省区，“北起奉、直，南至黔、蜀、三江两粤、闽浙齐楚之间，均有留学日本者”^④。至于内地学校更扩大到全国大多数州县。二是这些知识分子来自阶层较前广泛。留学生约半数是各省官费生，其余半数为自费生；他们多出自地主官僚家庭，也有不少出自小资产阶级家庭。

① 《湖南官报》第三百四十八号，第23页，光绪癸卯年三月三十日。

② 《苏报》1903年1月8日。

③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53—56、77—78页。

④ 《东京留学生答振贝子词》，《苏报》1902年10月2号。

其中有些则是逃到国外的维新志士或革命志士。随着女权和女学的提倡，妇女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投进学校或留学者越来越多。1902年在华教会学校中的女生就有4373人，占学生总数的43%强^①。中国人自己在戊戌变法时期已创办女学。1901至1904年，上海每年都兴办新的女子学校。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创设“爱国女学”，公然对女青年灌输爱国革命思想。1903年拒俄运动兴起时，很多女学生纷纷报名参加“对俄女同志会”。妇女留学外国者，最初出现于日本东京，到1903年，有记载的女子留日学生有十余人。这年4月，在东京组织了留日女学生团结爱国组织“共爱会”。1905年，留日女学生又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编印《中国新女界》杂志。留学美国的女学生也有记载，但无确切统计数字。从上述材料中，我们看到：20世纪初，妇女知识分子在不断增加，其政治觉悟也在不断提高。

其次，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爱国群趋革命。

1901年创刊的，得到孙中山资助的《国民报》露出了东京留日学界趋向革命的端倪。以后，宣传民主政治观念的报刊有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1901年—1903年先后出版的报刊有32种，其中1903年达17种，占了这几年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以《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苏报》、《湖北学生界》、《国民日报》、《浙江潮》、《江苏》、《湖南游学译编》、《俄事警闻》、《童子世界》等革命报刊影响较大。此外还有《恤书》、《三十三年落花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黄帝魂》、《孙逸仙》等34种^②。这些报刊书籍，反映了这一时期阶级状况和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多样性。往往同一报刊，乃至同一篇文章、同一本书，新学和

① 《清季的革命团体》，第78页。

②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289—291页。

旧学、革命和改良，交错并列。但究其主流，是新学排除旧学、革命战胜改良，由爱国急速转向革命。

在 1901—1902 年，像《开智录》那样敢于仗义执言，赞颂“义和团有功于中国”^①，或像《国民报》那样指责清政府“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倡言排满革命^②的还是极少数。大多数文章革命宗旨还不够明确、鲜明。有的对清政府的指责还往往“务为蕴借，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③。到 1902 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今者卢梭（骚）之《民约》论潮汹汹然，蓬蓬然，其东来矣！吾党爱国之士，列炬以烛之，张乐以导之，呼万岁以欢迎之”^④的情景。以 1903 年 4 月拒俄运动进入高潮为嚆矢，通过 6 月发生的震中外的“苏报案”和 7 月发生的清政府残暴杖杀沈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激化，“于是舆论愈激昂，而热血愈腾涌，几若全国一致，以奔满洲，势汹汹骤不可夭阏”。“即著名顽固之徒，亦勃然而生仇满之念”。连外国报纸也“议论颇激昂，皆言满政府之惨虐”^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样“辞多恣肆，无所回避”^⑥，充满革命激情的篇章了。这些篇章具有以下鲜明特色：

第一，宣传要爱国必须革命的思想。由于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无理残酷镇压，破除了和清政府“合心协力”、“开通民智”^⑦以保全中国的幻想，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第 58 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第 94 页。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第 649 页。

④ 《论黄黎洲》，《苏报》1902 年 9 月 10 日。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85、304 页。

⑥ 《辛亥革命》（一），第 308 页。

⑦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 页。